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卷)

[英] 迈克尔·曼 著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1卷/(英)曼(Mann, M.)著; 刘北成, 李少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ISBN 978-7-208-06725-7

I. 社... II. ①曼...②刘...③李... III. 权力-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027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

[英]迈克尔·曼 著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43.25

插 页 4

字 数 587,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25-7 / K · 1285

定 价 56.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一卷)

中文版前言

在所谓的第三个千年的开端，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分享这部涵盖五千多年人类经验的著作。

在此，我向你们说明一下我的两个主要论点。首先，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权力。政治权力也通过地缘政治延伸到国际领域，即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因此，我的研究就有别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理论传统。唯物主义通常强调经济，唯心主义通常强调文化——我给它命名为“意识形态”。社会理论经常被这两种理论传统的论争所左右。许多人认为我的研究是“韦伯主义的”，因为马克斯·韦伯在经济权力和思想权力之外又增添了军事/政治权力——由此产生出大家所熟悉的阶级、身份和政党这样的三元组合。韦伯主义的标签确有某些道理，当然对于我也是一种褒奖。但是，我有别于韦伯的是，我把军事/政治权力一分为二。无论韦伯有什么说法，许多国家，包括许多现代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自不待言，许多现代国家也是依靠别的大国来保护自己的。甚至有少数现代国家根本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疆域的军事力量。就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的情况看，更现代的例子就是“软性地缘政治”的发展。例如，日本政府能够对世界的“软性”经济问题或环境问题施展其政治权力，但是它却难以施展其军事权力。有组织的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政治权力)。在学者中，把历史和社会当作四种权力来

源的产物来分析,我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我把四种权力来源视为各种社会互动网络,其界限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人类的互动存在于纵横交错的网络中,而不是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这一点在1986年以后越来越明显了——我在那一年完成了《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的写作。民族国家(多数人都把它理解为“社会”)越来越被跨国的和全球的权力关系所穿透。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独立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也受到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巨大的影响——从外国资本到足球,到美国的军事压力。反过来,西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影响。但是,我认为,我们夸大了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孤立隔绝状况。中国原来就一直是亚洲的一部分,而且经常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帝国衰落时期,中国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影响,后来又采纳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它再次开始在上世界上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对中国并没有多少新意。

本书的前两卷包含着我对至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止的权力史的叙述。第一卷提到了中国,但是并非浓墨重彩,第二卷则几乎没有提到中国。对于我的叙事中的这种愈益严重的欧洲中心论,我向中国读者道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对世界其他地方缺乏学术研究能力(语言能力更是为零)。我的理论兴趣之一可能也带有一点欧洲中心论,即努力解释所谓的“欧洲的奇迹”——17—20世纪欧洲人(原先是一群相当落后的民族)异乎寻常地突进到世界领先地位。

自从我在1986年到1992年完成了这前两卷后,亚洲的经济发展声势浩大,由此产生了一种新“修正主义”,对“欧洲的奇迹”的经济侧面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似乎当时一些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地区,在经济上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先进和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如果我今天再来写这两卷的话,我会修改我的一些论点。但是,这些修正只是会强化我提出的人类社会的一般模式。因为我认为,经济发展深受意识形态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权力来源的影响,与这些权力

来源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欧洲人的确形成了一种遥遥领先于亚洲国家的经济优势——尽管有些历史学家把这种领先的时间推迟到 19 世纪初，而不再是 18 世纪。但是欧洲人在规模较小的军队里，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海军舰队里，发展集中的火力，从而形成军事优势。这方面他们成熟得更早。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能够主宰海岸线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贸易。这种霸权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相互呼应，创造了欧洲人的世界帝国。我仍然认为，历史上的确有过“欧洲的奇迹”，但是它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纯粹经济方面的。它也没有那么多“奇迹”这个词经常带有的那种慈善意味，因为它既有经济和政治进步的光明面，也有粗暴的武力和帝国主义构成的黑暗面。

在第二卷杀青之后的九年里，我越来越关注这种黑暗面。原先计划在第三卷中用一章篇幅论述法西斯主义，结果这一章扩展成整整两本书。我刚完成的这两本书分别是《法西斯》(Fascists)和《民主的黑暗面：对种族清洗的解释》(The Dark-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ing)。前者是对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后者则涵盖更大的历史和全球范围，直至 20 世纪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由于有这样一个大迂回，我最近才回过头来撰写《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这一卷将涵盖 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叶。在这一卷里，我保证将让你们看到比前两卷更具有全球视野的论述，其中将更广泛地论述亚洲和中国。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走过第一、二卷，最终读到那个论述。

迈克尔·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2002 年 1 月

前 言

1972年，我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决定论与结构变化”(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Structural Change)的论文，这篇文章的宗旨不单在于反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改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而且也意在提出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变革的更好的一般性理论的大纲。于是这篇文章开始向一本小册子发展。它打算包含得到若干实例(包括历史性实例)研究支持的一般性理论。后来，我决定这本书应该说明有关世界权力历史的彻底的理论。

然而，当发展这些设想的时候，我再次发现了凝视历史的快乐。十年埋头于该题目，增强了我原有教育背景中的实践经验主义，恢复了一点对于事实的复杂性和执拗性的尊重。但这并没有完全使我冷静下来。因为我所写的这本大部头书是农业社会的权力史，而且我将立刻继之以第二卷《工业社会的权力史》(A History of Powe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以及第三卷《权力论》(Theory of Power)——尽管现在它们的主要冲击已经缓和了。但这毕竟给我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即社会学和历史学可能彼此运用于对方。

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关键性问题关系到贯穿时代的诸过程；社会结构是从特定的过去继承来的；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复杂社会的“样本”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然而，没有社会学，这一历史研究也贫乏无味。如果历史学家避开有关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论，他们就会囿于有关他们自身社会的常识观念。

在这一卷,我对于把基本属于现代的观念——诸如民族(nation)、阶级(class)、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以及中央集权国家(the centralized state)——运用于较早的历史时期,再三地提出了疑问。在多数情况中,一些学者已先于我提出怀疑。但如果他们能够把含蓄的当代常识变成明确的、可检验的理论的话,他们会更早、更严格地普遍提出这种怀疑。社会学理论也可以在历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过程中训练他们。我们决不可能“有足够的学问”;社会和历史数据我们是整理不过来的。浓厚的理论意识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是关键性事实,什么是理解特定社会运作的主要东西和次要东西。我们选择我们的数据,观察它们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的理论预感,推敲后者,收集更多的数据,这样不断地在理论与资料之间循环往复,直至我们就这一社会此时此地如何“运作”确立似乎言之成理的说明。

孔德(Comte)的断言是正确的,即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王后。不过任何王后都不需要像有抱负的社会学家那样辛勤劳作!创造得到历史证实的理论不会如孔德所确信的那样顺理成章、势如破竹。在理论学识和历史学识之间循环往复会有不确定的结果。(历史或当代的)真实世界是杂乱无章的,而且不可能被完全记录下来,但理论则追求模式和完美。过多地以学究方式注意事实会使人失明;过多地倾听理论和世界历史的节奏会使人失聪。

因此,为在这一探险期间保持我的正常状态,我通常更加依赖于富有同情心的专家和同路的跨学科研究者。我从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约翰·霍尔(John Hall)那里受惠最大。自1980年在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举办“历史模式”研讨会以来,我们争辩了本卷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我特别要感谢约翰,他实际上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对之作丰富的评论,一直与我进行着讨论,而且对我事业的热情和支持一如既往。我亦不耻下问地利用了参加研究会的著名演说家,在讨论中把他们的卓越论文拉向了我执迷的问题,并就概念和专门知识向他们

盘问。

许多学者就个别章节作了丰富的评论，纠正了我可笑的错误，让我接触到他们领域的最新研究和争论，指明我错误的地方，甚至希望我更长久地停留在他们的领域并作更深的挖掘。按照我的章节顺序，我要感谢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斯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尼古拉斯·波斯特盖特(Nicholas Postgate)、加里·朗西曼(Gary Runciman)、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约翰·皮尔(John Peel)、约翰·帕里(John Parry)、彼得·伯克(Peter Burke)、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以及詹·波吉(Gian Poggi)。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阅读了我的倒数第二稿的全文，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批评。在这些年里，同事们对我的手稿、研究项目和论证作了有益的评论。我特别要感谢基思·哈特(Keith Hart)、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尼科斯·穆泽里斯(Nicos Mouzelis)、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和桑迪·斯图尔特(Sandy Stewart)。

埃塞克斯(Essex)大学和LSE的学生是检验我在社会学理论教程中的总体思想的热心观众。这两个机构慷慨地许可我研究和讲演这本书中的素材。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华沙科学院和奥斯陆大学的系列研讨会给了我广泛机会来发展我的论证。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准许我在1980—1981学年进行个人研究，并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在那一年我能够完成前边章节所必需的大部分历史研究，如果我承担正常的教学，那么完成这件事就难多了。

埃塞克斯大学、LSE、大英博物馆还有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妥善地满足了我随意取材的要求。我在埃塞克斯大学和LSE的秘书——琳达·皮奇(Linda Peachey)、伊丽莎白·奥利里(Elizabeth O' Leary)和伊冯娜·布朗(Yvonne Brown)——卓有成效地做完了交给她们的工作。

尼基·哈特(Nicky Hart)解决了关键性问题，从而把这部著作重组成了三卷。她本人的著作以及她的存在——连同路易斯(Louise)、加雷斯(Gareth)以及劳拉(Laura)——使我不至于被这一项目搞得失明、失聪甚至过于鬼迷心窍。

显然，本书中的错误由我承担。

目录

中文版前言/1

前 言/1

第一章 作为有组织的权力网络的社会/1

第二章 一般社会进化的结束：史前人如何躲避权力/43

第三章 美索不达米亚的分层、国家和多种权力行为者文明的出现/93

第四章 对分层、国家和多种权力行为者文明出现的比较分析/132

第五章 最初的支配性帝国：强制性合作的辩证法/162

第六章 “印欧人”与铁器：扩张中的多样化权力网络/221

第七章 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分散化的多种权力行为者文明/235

第八章 复兴的支配性帝国：亚述和波斯/287

第九章 罗马人的领土型帝国/311

第十章 超越性意识形态：基督教信徒世界/374

第十一章 世界宗教的比较：儒教，伊斯兰教，(尤其是)印度种姓/422

第十二章 欧洲的动态发展(一)：深入阶段，800至1155年/461

第十三章 欧洲的动态发展(二)：协调性国家的兴起，1155至1477年/513

第十四章 欧洲的动态发展(三)：国际资本主义与有机的民族国家，
1477至1760年/553

第十五章 关于欧洲的结论：欧洲动力的解释——资本主义、基督教
和国家/613

第十六章 农业社会世界历史发展的模式/635

译者后记/665

第一章

作为有组织的权力网络的社会

本书所拟定的这三卷，提供的是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与理论。这是相当困难的。而片刻的回顾好像更使人胆怯：权力关系的历史和理论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和理论在实际上难道不同义吗？这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对于可见于人类社会史中的某些主要模型，撰写一个总体说明，不论部头多大，在 20 世纪末都是不合时宜的。这种堂皇的概括，维多利亚式的探险——以对第二手资料的帝国式掠夺为基础——在 20 世纪浩繁的学术卷帙和密集的学术专家队伍的重压之下已奄奄一息了。

我的基本理由在于，我已得出了一种观察人类社会的独特的、一般的方法，这种方法与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章将解释我的探讨。这些未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的东西，其组成部分可能是单调乏味的。要是那样的话，有一种阅读本卷的变通方法。跳过这一章，直接进入第二章，或者，实际上可以进入任何叙事章节，一直继续到你被所用术语或隐晦的理论要点搞糊涂，或是对之提出了非难。然后，再回到这一介绍以求得指导。

我的探讨可以概括成两个陈述，由此而生成特有的方法论。第一个陈述是：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如果我用三段文字说明社会不是什么，那么我探讨的这一独特性就会立刻得到理解。

社会不是单一的(unitary)。它们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社会系统

(systems); 它们不是整体(totalities)。在地理或社会空间, 我们决不会找到一个受到单一限定的社会。因为不存在系统, 不存在整体, 所以不可能存在这种“整体”的“子系统”、“维”(dimensions)或“层次”(levels)。因为不存在整体, 所以不可能“最终”、“最后”使社会关系适合于整体的某种系统性特征——诸如“物质生产方式”、“文化”或“规范体系”, 或“军事组织形式”。因为没有受到限制的整体, 所以把社会变化分为“内生的”和“外因的”变体是无益的。因为没有社会体系, 所以就没有其中的变化过程。由于人类没有被分成一系列受到限制的整体, 因此他们之间就未发生社会组织的“蔓延”。因为没有整体, 个人在其行为中未受到“社会结构整体”的约束, 因此区分“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是无益的。

上一段对我观点的夸张性叙述是为了给人以印象。我是完全需要这些观察社会的方法的。然而, 大多数社会学的正统学说——诸如系统论(systems theory)、马克思主义(Marx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规范功能主义(normative functionalism)、多维理论(multidimensional theory)、进化论(evolutionism)、传播论(diffusionism)和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却因为把社会理解成一个无问题的、单一的整体而破坏了它们的洞察力。

在实践中, 受到这些理论影响的多数说明都把政体(polity)或国家(state)作为它们的“社会”(society), 作为它们用于分析的整体单元。然而, 国家只是我准备探讨的权力网络的四种主要类型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nation-state)对于人类科学巨大的隐蔽影响, 意味着民族国家模式同样支配着社会学和历史学。没有这种影响的地方, 在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中间, 有时“文化”被赋予了优越地位, 但即使是这种文化, 也往往被认为是单一的、受到限制的“文化”, 是一种“民族文化”。不错, 某些现代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摒弃了民族国家模式。他们把社会等同于跨国经济关系, 要么用资本主义要么用工业主义作为他们的主要概念。这在另一个方面又走得太远了。国家、文化